
也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

——就教于马仲廉先生

李继华

1995年《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发表了拙作《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层次与阶段划分》(以下简称“拙作”)。1996年,该刊第3期又发表了马仲廉先生的《再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一文(以下简称“马文”)。马文对拙作既有相当的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使笔者深受鼓舞和教益。对马文的不同看法,笔者有的可以理解和接受;有的则难以理解和赞同,特写出来向马先生及其他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请教。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在第一部分中,马文论述了“划分战争阶段应有统一的根据”,肯定“抗日战争,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战略阶段的划分,应根据中、日双方战略形势的基本变化,即在战争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攻、防的变化而决定”。对这些原则,笔者完全赞同。但在介绍“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史”这两种观点时,马文指出:“前者是从通史、革命史、党史等角度划分的,而后者是从战争史角度划分的”。对此,笔者认为,后者固然是,也只能“从战争史角度划分”,前者却并非只能“从通史、革命史、党史等角度划分”。实际上,前者也可以看作“从战争史角度划分”。也就是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从战争史角度”来理解,只不过前者强调的是中国革命

(进攻)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这就令人难以苟同了。既然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都“属于战略防御范畴”，也就是说战略反攻被包含于战略防御之中，那么战略相持又怎能介于“防御与反攻”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之间，成为“防御与反攻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呢？至少在抗日战争的战略过程中不能这样说。实际上，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应该是在战略防御的总态势下，从我之战略退却、敌之战略占领到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过渡阶段。马文说战略相持介于“防御与反攻”之间，其实是沿用了毛泽东对抗战三阶段中中方态势的表述。这种表述，特别是其中对抗战第一阶段中方态势的表述，已经是拙作深入探讨并试图作出不同表述的问题。对笔者的这种探讨，马文也承认，“中国的抗日战争只有战略防御，这种总的态势一般说是对的”，“将第一阶段的‘我之战略防御’改变为‘我之战略退却’是有道理的”。这样，毛泽东对抗战第一阶段中中方态势的有关表述，已不能作为理解“战略相持”含义的既定前提。马文或许不自觉地沿用了这种表述，就容易使他的一些说法自相矛盾，也很难使人准确理解“战略相持”等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三

在“关于毛泽东的中日战争三阶段论”中，马文说不能“因为出现了‘层次’和‘概念’的问题，就必须改变《论持久战》中的有关提法”，特别是认为没有必要将抗战第一阶段的中方态势，由毛泽东所说的“我之战略防御”改称为中国的“战略退却阶段”。对此，笔者想作如下解释：

首先，既然马文也承认拙作“提出的抗日战争‘两个战略层次的敌攻我防（一是抗战的总态势，一是抗战的第一阶段）’的层次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将第一阶段的‘我之战略防御’改变为‘我之战略退却’是有道理的”，而且毛泽东自己也曾肯定“抗日战争当然没

防御'改称为“我之战略退却”。这实际上也正是逐渐揭去对抗战第一阶段中中方战略态势表述上的“纱幕”。在时过 5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透过历史的这层纱幕,为抗战第一阶段的有关表述正名。

再次,马文还引述了朱德在中共“七大”军事报告中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第一阶段中向敌后“反攻”的论述,来证明抗战第一阶段的中方态势是战略防御,而不是战略退却。对此,拙作已经指出:“这一阶段中‘我国的战略退却’总态势,并没有因为敌后战场的开辟而改变。”由于论题和篇幅所限,笔者在当时对这一点并未展开论述。具体地说,对抗战第一阶段中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不能简单地视为“反攻”。“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战罢了。”这样,八路军新四军的挺进敌后,就带有“乘虚而入”的性质,而且,“自挺进敌后到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也是避敌锋芒,“展开于敌之翼侧”,“在日军之翼侧和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战役上和战略上配合与动摇正面战场友军作战”。这样,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作战,就很难说是一种“反攻”。退一步说,即使承认它具有“反攻”的性质,它也只是敌后战场上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局部反攻,不是全国战局中的战略反攻,因而不足以改变整个抗战第一阶段作为“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的总态势。此外,就在《论解放区战场》这同一个报告中,朱德还肯定“抗战全过程包括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41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83 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8 页。

述抗战总态势中的日军态势)还不够用,必须有一个新的概念,用来表述抗战第一阶段中的日军态势。

其二,到底运用什么新概念表述抗战第一阶段中的日军态势呢?最初,笔者曾考虑过“战略进占”、“战略攻占”等概念,最终还是确定使用“战略占领”这个概念。在军语中,虽然还不能直接找到“战略占领”概念,却有“占领”和“军事占领”这两个概念作为基础和依据。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解释:“占领 军队进入或夺取某一地方或目标的行动。”“军事占领 一国以武装力量占据他国领土的行动。”《汉语大词典》解释:“占领 以武力占有对方控制的土地。”《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占领 用武装力量取得(阵地和领土)。”前苏联1983年出版的《军事百科词典》解释:“占领(源自拉丁文Occupatio——夺取)国际法上指用武装力量对敌国领土的临时占领和行使对占领区的管理。占领的性质取决于战争的政治目的。”《苏联百科词典》则解释:“占领 又称军事占领。国际法上指某个国家用武力暂时占领敌国的领土。”

综上所述,“占领”的基本含义是:“以武力占有对方控制的土地;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则指一国以武装力量占据他国领土的行动。”应该说,“占领”一词带有相当程度的战略意义;如果运用“战略占领”这一概念,则可以将“占领”一词包含的战略意义突出表现出来。

这样,“战略占领”的概念,虽然在军语中难以直接找到,却也并非笔者的闭门造车。它还是以“占领”和“军事占领”这两个概念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战士出版社1982年修订版,第60页。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62页。

《汉语大词典》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993页。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38页。

《简明军事百科词典》(苏联《军事百科词典》中文选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1页。

《苏联百科词典》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9页。

改变的。日军的“战略保守”或曰“保守占领地”，保守的既是第一阶段中战略占领的成果，也是日军在总态势上战略进攻初期成果。日军的战略退却，也只是从所占中国领土上的退却，亦即从其战略进攻成果上的退却，退却的终点也就是它发动战略进攻的起点。因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期所处的战略保守态势和末期所处的战略退却态势，并不否定它在总态势上的战略进攻地位。中国军队的准备和实行战略反攻，也正是针对日军的战略进攻而进行的。正如军语中所说：“反攻 对进攻之敌采取的进攻行动。通常是用于战略范围，如战略反攻。”也正如马文所说：“战略反攻是处在战略防御地位的军队对战略进攻之敌采取的全面的进攻行动”（黑体字为引者所标注）。也就是说，中国的准备和实行战略反攻，正是以日军处在战略进攻地位为前提的。

其四，马文说，“日军从华北、华中两个方向上对中国内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种作战行动是完完全全、确确实实的战略进攻，用别的表述取代是不合适的”。对此，笔者已几次说明：“战略进攻”的概念，最适宜于表述抗战总态势中的日军态势；对抗战第一阶段的日军态势，则只能运用新的概念来表述。马文说日军在第一阶段中的“作战行动是完完全全、确确实实的战略进攻”。笔者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既然对这种作战行动已不能用“战略进攻”的概念来表述，难道我们就不能提出或运用一个与“战略进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概念来表述它吗？笔者认为：“战略占领”的概念，可以充分表达日军在第一阶段中的作战行动，也即马文所认定的这种“完完全全、确确实实的战略进攻”。况且从总态势上说，日军的整个侵华战争，也是“完完全全、确确实实的战略进攻”，也很难用别的概念来表述。如果马文实在觉得用“战略进攻”这个概念来表述抗战第一阶段的日军态势更好些，那就只能将其称作“狭义的战略进攻”。这样做，笔者认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只是很难与总态势

上的日军“广义战略进攻”这种表述区分得更明晰、更准确。

其五,马文说“将第二阶段改为‘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也不必要,因为战略相持是敌对双方共同的一种过渡形式,原来的‘敌我战略相持阶段’表述的非常简明准确,何必要改为累赘的表述呢?”其实,将抗战第二阶段既称为“敌我战略相持阶段”,又称为“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笔者对抗战战略过程的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只限于抗战的总态势和第一阶段的双方态势;对抗战第二、第三阶段的表述,仅仅是沿用毛泽东或史学界的通常说法,并无深入研究和新的表述。而且,笔者将毛泽东的上述两句话合在一起,也很难说是一种累赘的表述。这是因为,“敌我战略相持阶段”,固然是“敌对双方共同的一种过渡形式”,固然“表述的非常简明准确”,却未进一步指明在这种共同的“过渡形式”中,敌对双方各自的战略态势(敌战略保守我战略退却)是什么。笔者在论证抗战第一阶段的日军态势应表述为“战略占领”时,又曾经把这种表述与日军在抗战第二阶段中的“战略保守”态势作比较,认为“战略占领”这种表述,可以与“战略保守”的表述较好地衔接。这样,只指出抗战第二阶段是“敌我战略相持的阶段”显然还不够。把“敌我战略相持的阶段”和“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这两种表述合在一起,把第一种表述具体化,则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师专政治系)

(责任编辑:荣维木)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马文也引用过这句话。

不能忘记的历史

——评孙金科著《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罗焕章

列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所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的《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一书，是近年来研究日本人民反战斗争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之一。该书作者孙金科，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至1945年败降期间，在日本国内、中国解放区、中国国统区等地，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全部过程；客观地评价了反战斗争各方面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特别是用较大篇幅反映了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重心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行瓦解敌军、优待和教育日军俘虏，促进反日本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从而形成的蓬勃发展的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综观全书，可以发现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史料较为丰富，叙史较为准确。该书对各阶段反战斗争历史的记述，比较完整、细致具体，使人在阅读中有亲临其境的感觉。这反映了作者掌握完整史料，进行深入研究而达到的功夫。作者从50年代起即立志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俘虏政策和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研究，开始广泛搜集和挖掘各方面的资料。他特别注重当事人的文刊、回忆等资料，搜集了包括日本反战运动领导人野坂参三、吉积清（森健）、鹿地亘等人，以及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等人的资料。经多年的辛勤耕耘，作者积累了数百万字的各方面重要资料。在资料丰富

战争史(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战争史)中的“抗日战争时期”,后者强调的则是“抗日战争”。单讲抗日战争史,自然可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而前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继“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则要依据主要矛盾的变化,依据国共内战和中日战争的此消彼长来确定其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就很难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结束了,也很难说“抗日战争时期”可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而只能说“八年抗战”。因此,上述两种观点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前者是从通史、革命史、党史等角度划分的,而后者是从战争史角度划分的”;而在于前者是较大范围战争史中的一个时期,后者则通常是被单独考察的一次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从战争史角度来研究抗日战争,不仅可以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在终点上还可以延续到1945年8月以后。也就是说,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其终点只能在1945年8月;作为“抗日战争”,则可以延续到同年9月2日、10月10日乃至年底。以这种延续为基础来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种战略反攻,是有准备、有开始标志、并且延续了几个月的;而不能说“中国战场将要出现的战略反攻未能实现”。马文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该是两个阶段”,不承认抗日战争有战略反攻阶段,恐怕正由于混淆了“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这二者的区别。

二

在“应准确理解军事术语的定义和概念”一部分中,马文介绍了“战略进攻”、“战略相持”、“战略退却”、“战略反攻”等概念的含义,这对深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非常必要。但是,马文在正确肯定“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都是属于战略防御范畴的战争行动”之后,却又说“战略相持则属于进攻与防御(退却)之间,或防御与反攻

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整个战略防御”；并在1938年10月以后几次将抗战第一阶段称作中国的“战略退却阶段”，那么，为什么不能改变“三阶段论”的提法？

其次，为了证明抗战第一阶段“是应该或可以说成是战略防御的”，马文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不说退却而说防御，是说以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不是一下子干脆退却”，并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笔者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固然“十分清楚”，但如果用它来证明抗战第一阶段“是应该或可以说成是战略防御的”，则反而使人莫名其妙。仔细分析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它恰恰说明本应该把抗战第一阶段称作我之战略“退却”的，而不说“退却”却说“防御”，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战略退却，应该采取“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在这里，“战略退却”是实质；“战略的运动防御”则是“姿态”，或曰应该努力争取做到的“姿态”。“节节抵抗”的另一面正是节节退却，目的只是为了避免“一下子干脆退却”。因此，这句话恰恰使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对抗战第一阶段中中方态势的表述存在的“纱幕”。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为抗战第一阶段中的中方态势披一层纱幕，有必要吗？”对此，拙作已经说到：“这是为了强调中国军队的战略退却应是积极的，而不应是消极的溃退。”毛泽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鼓舞中国军民的斗志，推动全国抗战形势的好转，同时也包含有批评国民政府军队消极溃退之意。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毛泽东才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这两个本来不宜运用于同一层次的概念并列使用，把抗战第一阶段称作“我之战略防御阶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这样做既无可厚非，也很有必要。而在1938年10月以后，因为抗战第一阶段在客观上已经结束，战争初期的某些考虑已没有必要，毛泽东乃逐渐将“我之战略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拙作中在论述这一点时，误把“战略反攻”抄写成“战略进攻”（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第33页第14行），特此更正。

段”。这显然是把抗战第一阶段明确表述为中国的“战略退却”阶段。因此，朱德的有关论述，不但不能证明马文所说“‘抗战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表述是准确的、清晰的，是没有什么‘纱幕’遮盖的”；反而证明了抗战第一阶段的确应该被表述为中国的“战略退却”阶段，的确应该揭去“我之战略防御”这一表述上的纱幕。

四

在“关于三阶段的表述”这一部分中，马文认为拙作“将‘敌之战略进攻’改为‘敌之战略占领’就使人弄不清了”。对此，笔者解释如下：

其一，既然马文也肯定拙作所说“抗日战争的‘两个战略层次的敌攻我防（一是抗战的总态势，一是抗战的第一阶段）’的层次论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在概念表述上就要区分这两个层次。简单的方法，是将其分称为广义和狭义的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但为了将其区分和表述得更明晰更准确，还是应该提出或运用两个适当的新概念，从而只在一个层次上运用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的概念。

“战略进攻”概念，在中外军事史上通常都与“战略防御”概念相对应地使用。既然马文也承认“中国的抗日战争只有战略防御，这种总的态势一般说是对的”。也就是说，对抗战总态势中的中方态势，可以用“战略防御”的概念来表述，那么对这一总态势中的日军态势，就只能相对应地用“战略进攻”的概念来表述。而对抗战第一阶段中的日军态势，则只能提出或运用新的概念来表述。因此，拙作并不是如马文所说放弃“进攻这种准确的军语不用，而改用含混的表述”；而是因为只有“战略进攻”这个概念（已被笔者用于表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5 页。

为基础和依据的。如果注意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含义，马文也许会对“战略占领”概念感到“好理解”一点，感到不那么“含混”了。

其三，说到占领与进攻的关系，马文说“占领是进攻的结果”，这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具体分析起来，并不是所有的进攻自始至终都在占领。对于从战争初期就开始，而不能顺利发展到战争结束的战略进攻来说，战略占领往往只是它的鼎盛时期。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则应该说，只是在其总态势上的战略进攻的初期（1938年10月之前），日军才有对中国的战略占领。按照笔者的观点，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是整个抗日战争的总态势。也就是说，日军的战略进攻贯穿抗日战争全过程。但这不是说，在这个长达八年的全过程中，日军的战略进攻状况一成不变，实际上，这种总态势上的战略进攻，经历了从日军的“战略占领”，到“保守占领地”，再到“战略退却”的变化。这是一个从兴盛到衰落，再到最后失败的战略进攻过程。只是在战争初期（1938年10月之前），日军的战略进攻才占领了中国的许多城市和大片领土。正如拙作在论述抗战第一阶段中中国军队的战略退却态势时所说：“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国民党军队的防线，由沿海向内地后退约900公里，由华北向华中后退约1800公里，共丢失900余县，930余座城市，约16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就是日军在这一阶段中的“战略占领”态势。而在1938年10月之后，日军的战略进攻仍在继续，对中国领土的占领也有所扩大。但这种扩大已不具有最高的战略意义，已不能称作“战略占领”了。就全局战况来说，日军的战略进攻已进入到“保守占领地”或曰“战略保守”的阶段了。

当日军的态势已是“战略保守”（第二阶段）乃至“战略退却”（第三阶段）时，仍说其在总态势上处于“战略进攻”地位，这是否有些自相矛盾？笔者认为，这两个层次的问题，是辩证统一的，也是不难说清的。日军一发动侵华战争，就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在中国军队把日军赶出国土之前，日军这种战略进攻地位在总体上是不会